

馮玉祥和鮑羅廷

王禹廷

馮玉祥與西北軍之二十一

唐生智的起伏反覆

上期燕文中關於唐生智的年齡，實係「三八」歲，一時疎忽，誤寫為「二九」歲。

唐生智失敗後，他的部隊退駐湖南。十七年繼續北伐時，劃歸第四集團軍的序列。總司令李宗仁率領其桂系各軍，坐鎮武漢，而以前敵總指揮白崇禧率領新撥入的唐部第八、十二、三六等三個軍，沿京漢路北進。直抵河北東部的灤東地區。十八年二月，李宗仁在武漢立異，中央一面派兵「討桂」，進攻武漢。一面起用唐生智，馳赴（北）平、（天）津，收撫舊部，以殺桂軍之勢。唐之參謀長龔浩，攜帶巨款，由天津轉往灤東，秘密召集團長以上幹部舉行會議，宣佈中央已任命唐生智為第五路軍總指揮，即日回軍。并即加發官兵薪餉三個月，以收人心。於是由第八軍軍長李品仙領銜，發表擁護中央的通電。白崇禧以變起倉卒，無法挽救，遂即悄然離開軍隊，沿海道隻身南行。唐生智即在北平發出通電，就任討逆軍第五路總指揮職。當唐生智與龔浩北上

時，曾密商對白崇禧如何處置，原打算把他乘機槍殺，後來唐又覺得「殺了他，以後就沒有好戲可唱了。」因而放了白崇禧一馬，任其遁去。

先是是年一月，馮玉祥因對國軍編遣方案有所不滿，離（南）京返豫（河南），一時謠言大起。六月，中央任命唐生智為軍事參議院院長，所部軍隊，移駐平漢線鄭州以南附近地區，監視馮軍行動。十月，中央下令討伐馮軍，以唐生智為前敵總指揮，所有前線各軍，均歸唐統一節制。蔣總司令電令有云「即本總司令亦惟唐總指揮之意見是從。」唐率軍奮勇進擊，馮軍不支，旋即西退。十二月初，駐在粵（廣東）、桂（廣西）方面的張發奎、李宗仁，駐在南京對岸浦口的石友三，駐在鄭州的唐生智，先後發表通電，宣佈受汪精衛命，分任「護國救國軍」第一、二、三、四路軍總司令，「擁汪反蔣」。唐生智即率所部，沿平漢路南下，向武漢進兵。據說，唐在奉命討馮之先，曾與各方有所連繫，建議中央，請蔣（介石）、汪（精衛）、胡（漢民）釋嫌合作，共主國政，已獲同意。所以唐到前線拼命作

戰，獲得迅速勝利。以後馮軍西退，南京政情變化，前言未曾兌現。唐等乃以實力擁汪（精衛），「護黨救國」。當唐於年初奔走再起之時，曾對有關人士親函表示：「有生之年，不再反覆。」因而獲得重用。此番他在鄭州異動，有人以背義失信相責。他反說別人違諾在先，不能單獨怪我。此言也，十足顯示其反覆無常，自欺欺人。後因各軍行動遲緩，且不一致，被中央從容部署，各個擊破。唐生智失敗後，抱定「置之死地而後生」的決心，化裝逃到中央軍戒備嚴密的開封，住在憲兵隊附近的小旅館，然後再轉赴徐州，乘津浦路火車至天津，搭輪赴香港。

唐生智離軍後，所部高級將領劉興、龔浩、晏助甫等人，共同商議，認為這枝軍隊如果繼續存在，一有機會，唐生智仍會利用投機，不利國家。乃決定向中央投誠後，一律繳械遣散，永絕禍根。此一在北伐期間轉戰南北，建立大功的軍隊，就這樣歸於消滅了。

二十年五月，粵（廣東）、桂（廣西）方面，以胡漢民幽居事件為藉口，在廣州自行成立一

個國民政府，與南京中央正面對抗，唐生智被選為十五位國府委員之一。

不久，「九一八」事變發生，全國要求共赴國難，國民黨力謀團結，乃有寧（南京）、粵（廣州）合作的進行。

民國二十年十月，汪精衛、唐生智、張發奎、黃紹雄等，自廣州乘輪赴上海，途中遇暴風，輪船震盪的很厲害，唐笑謂同行諸人：

「如果輪船翻了，大家都葬身魚腹，中國可能從此太平」。

此言雖係戲謔之詞，亦足顯示其粗豪本色。以後寧（南京）、粵（廣東）合作告成，中央政府改組，蔣主席介石先生宣告下野，不久即出任軍事委員會委員長，林森出任國民政府主席，汪精衛繼孫科為行政院院長。唐生智被任軍事參議院院長。二十三年十二月，轉任訓練總監部總監，二十四年任陸軍一級上將。在此數年，一直居留南京，過其居高位而不負責任的公職生活。

二十六年冬，上海撤退，南京吃緊。中樞準備西遷，并作保衛大南京的軍事部署。最高統帥蔣委員長，在一次高級軍事會議中，徵詢各將領的意見及留守南京負責指揮的人選。唐生智立即慷慨應命，担任首都衛戍司令長官。他這種臨危受命的精神，及其公開宣示與南京共存亡的豪情壯語，頗博得國人的喝彩。不旋踵間，南京棄守。唐生智倉惶渡江，沿津浦、隴海、平漢各路，轉赴漢口。他經過河南歸德時，曾停車小憩，對人慨談南京不守的原因，說是「將有退心，士無

鬥志。」言下頗為沉痛。筆者當時在場，親聞其聲，目觀其情，也不禁為之唏噓。蓋上海大撤退之後，敵騎緊蹙而至。防守南京的部隊，多係臨時抽調，或由前線撤退而來，兵力不足，士氣不振，加上唐生智予智自雄，狂妄不善馭衆，難怪其失敗也。自此以後，唐生智就沒沒聞了。

鮑羅廷的「聯馮」策略

現在要說「聯馮」了。

鮑羅廷主宰之下的武漢政權，對於「聯馮（玉祥）」的這着棋，看的非常重要，作的也非常積極，乃是基於以下的原因：

一、蘇俄「爭取」中國，採取了多種多樣的方向和策略。它雖然已經得到 國父領導的南方革命勢力與之合作，但在軍事實力及地緣關係上，却特別看重馮玉祥。民國十四年春間，即已與馮玉祥有所接觸，而且已開始對馮軍予以軍火接濟。十五年夏秋間，馮玉祥訪問莫斯科，史達林更同意以大量武器裝備援助馮軍，視馮為其主要的「盟軍」。

二、十五年七月九日，蔣公介石總司令誓師北伐後，莫斯科八月四日舉行的對華會議，偏重於支持馮玉祥。會中只注意研究如何「援馮」，及討論馮組「西北政府」是否時機適當問題。對於廣東協同湖南計劃北伐，則認為不利。并決議「完全反對廣東軍之出境」。

三、俄共既視國民黨的新興領袖蔣公介石為其赤化中國的最大「敵人」，武漢政權就認為必須「倒蔣」才能赤化。所以它就運用各種途徑，

採取各種方法，從事「倒蔣」。「聯馮」即為其重要的「着」。

四、馮玉祥自五原誓師後，進兵甘（肅）、陝（西），逼臨中原，已成爲與南方革命勢力對稱的北方革命勢力的主力軍。馮玉祥出身寒微，他部下的官兵大都是北方農村的質樸青年，照共產黨的說法，「階級成份」很好，合乎它們的要求，必須爭取合作。

五、國民政府奠都南京，全面清黨之後，武漢已陷於四面楚歌之境。它必須覓取馮玉祥的合作，一方面可以壯大自己的聲勢，一方面可以保持通過西北、外蒙，與蘇俄直接聯繫的交通要道。

基於以上的各種原因，武漢政權透過馮的代表徐謙和劉驥的關係。對於馮玉祥的拉攏支持，進行的不遺餘力。

徐謙得以出任國民政府司法部長及「臨時聯席會議」主席，就是他具有馮玉祥的代表身份，以馮的實力為背景的。而馮玉祥出任國民革命軍第二集團軍總司令出兵潼關，會師鄭州。舉行鄭州會議，成立河南、陝西、甘肅三省的省政府，組織并主持開封政治分會等，一連串的舉措，都是在武漢政權的安排支持之下進行的。照這樣的情形看起來，武漢政權的「聯馮」運動好像收效甚至成功了，馮玉祥也好像向武漢政權完全靠攏了，其實却不是的。

此中原因，主要的當然是馮玉祥堅持他的立場和主張，他對國民革命的立場站得穩，打倒軍閥反共救國的主張把握得緊，另外也是蔣總司令

介公的偉大感召和極力爭取。所以在鄭州會議開過之後，他馬上就到徐州，與蔣總司令及南京方面的要員，舉行會議，便完全站在蔣總司令的一邊，爲反共革命而共同奮鬥了。

此中過程，至爲曲折而繁複，我想留待中原會師和鄭（州）、徐（州）會議之時，再行細談，這裡先把武漢分共後，鮑羅廷被逐回國，經過鄭州，跟馮玉祥會晤時的一些重要談話，提前寫出。使讀者對於這一關節，先有一個瞭解。

馮鮑鄭州會談內容

鮑羅廷於民國十六年七月二十八日，由漢口到鄭州，取道西北返俄。

馮玉祥其時雖已實行清共，但對鮑仍以禮待之。鮑羅廷留鄭州期間，曾和馮有幾度晤談。他們第一次見面時，就有一段舌槍唇劍的精彩對話。鮑說的是英語，當時担任翻譯的是馮總部的外交處長簡又文。他們當時會談的經過是這樣的：

第一次（七月二十九日）。

鮑：「蘇俄用了三千餘萬鉅款，我個人費了多少心血精神，國民革命才有今日之成功，而今則人人皆迫我去。我失望之極，傷心極了。」

馮：「我國所需要的是國民革命，不是共產革命。您們在兩湖（湖南湖北）橫行無忌，使舖夥打店東，佃戶打地主，學生打師長，猶且焚殺搶掠，行同土匪。您須認罪。」

鮑：「連您也通電驅逐我，尤令我大大的失望。大約是環境迫您，旁人勸您，說我壞話，故而如此。」

馮：「武漢諸同志，汪（精衛）、孫（科）、顧（孟餘）、徐（謙）等來此，均說您們不是。我所以發電請您回國。」

鮑：「起初，我們對您有很大的希望，期待您入豫（河南）之後，出兵由徐州攻南京，一舉而打倒蔣介石，即推您爲全國總司令。可惜我當時因病未能來鄭州晤見而勸您。而今機會已去了。但您何故要去徐州與蔣聯合呢？」

馮：「理由很多，請您猜猜。」

鮑：「第一，因餉械之補充，須仰仗寧（南京）方；第二，因雜牌隊伍及山西閻錫山之牽制，使您不敢助（武）漢攻寧（南京）。是否即此理由？」

馮：「您所猜的都對。不過尚有一要點，您所不知。蔣已聯絡了岳維峻，（按，原國民二軍，其時爲馮部第二集團軍第五方面軍。岳向蔣總司令輸誠，筆者已在前面提到過。）使其攻陝，襲吾後路。我舉動稍一不慎，全軍即被截爲數段，蔣已叉着我的咽喉，（言下以手作勢，自扼喉部。）我怎能不到徐州呢？」（按，馮氏此語，似無可疑。蓋「防人之心不可無」，蔣公於馮氏未作具體合作的明顯表示以前，利用岳維峻扯他後腿，未嘗無此必要。但仍有很大的誇張成份，因爲他跟蔣總司令的結合，是經過很久醞釀，多方奔走，才告決定。以岳維峻當時的實力及行動，對馮不會構成如此重大的威脅。）

馮對鮑羅廷的反駁

第二次（七月三十日）。

鮑明白表示意見，主張民衆——農工——直接行動，才是澈底的革命方略。

馮不謂然，說：「如果在軍閥或專制政府之下，實行秘密革命工作，則此類行動，很爲合理，藉以推翻他們。然而在革命政府之下，此事可以按軌道，而且必須按軌道。否則不特社會秩序破壞，兼是自己革自己的命了。」

鮑質問其有何具體例證。

馮乃一一數出陝西黨部及民衆運動之胡鬧行爲，或隨意殺人，甚至持劍刀殺人，劍至頸上則又縮手收回，致令其人飽受驚嚇，宛轉啼號，方被害死者。

鮑乃強辯，說：「在革命時期，過火舉動，在所難免。此輩冤死者，乃爲革命不可避免的犧牲。俟革命成功後，舉國將以花圈紀念之。」

馮聽了既焦急又憤恨，力駁云：「那是另一問題。目前最重要的問題，乃是我們承認此項問題是對抑或不對，這是非問題。」

鮑：「黨怎麼說？」

馮：「最可痛的，就是黨是以爲對的。」

鮑似乎洋洋得意，欣然說：「既然黨以爲是對的，那麼一定是對的了。『黨權高於一切』，我們還有什麼可說的呢？」

馮高聲說：「然而并不是全黨，或大多數都說是對的，那不過是少數幾個執行委員的主張罷了。」

鮑：「那麼，不成問題，少數應當服從多數，多數應當懲罰那少數啊！」

馮展顏而笑，面現得了全勝的顏色，說：「

對了，對了，那多數就是國民黨員，那少數就是共產黨員啊！」

馮氏憑其這樣辯才無礙的口舌，把鮑羅廷逼到屋角，無可轉身，使其感到理屈詞窮，無話可說，張口結舌，半晌不能發一言。這位猶太人稱雄逞智，縱橫一時，當過律師的俄共要角，竟被一個沒有受過正規學校教育，而是大兵出身的軍人所難倒。尷尬之情，實在難堪極了。

鮑旋又問馮：「然則依您的辦法，便應該怎麼做呢？」

馮很高興的答道：「依國民黨的辦法，即是我所主張的辦法，土豪、劣紳、貪官、污吏，應由革命政府依法懲治。社會種種的腐化、惡化，或農工之不平等待遇，應由革命政府訂立法律裁制，改善或創新。如是，革命乃有進步和成功之可言，三民主義乃可實現。例如：工廠如何改良？農田怎樣改革？只要立幾條法律，便可施行，又何必殘民以逞呢？」

鮑立加辯駁，說：「如此，只是上層工作。要革命成功，非從下層工作入手不可。」

馮聽了莞爾而笑，反駁說：「中國還有宣統皇帝嗎？還有貴族嗎？還有專權獨裁的總統嗎？那些才真是上層階級。我們革命黨人都是下層人物。我是泥工的兒子，無產階級出身。我們執掌了革命政權，訂定和厲行革命法律，以為大多數同胞謀幸福。那還不是下層工作嗎？」

鮑竟無言以對。這是在中國最後一次所打的敗仗。

馮乃掉轉頭來，以謙虛的態度，請教今後革命進行方略。

命進行方略。

鮑說：「前兩月，我很希望您攻寧（南京）倒蔣（介石），今則沒用了。為今之計，您當急攻武漢。一得兩湖之地，即可養兵十萬，又有漢陽兵工廠以補充軍械，則國民黨勢力，尚可保持長久些。」

馮聞而咋舌，支吾不答。却對担任翻譯的簡又文說：「老鮑真兇啊！真兇啊！」蓋馮自有其充分理由，決不作南攻武漢之想，惟有付之一笑而已。

鮑又對馮說：「今後中國國民革命已走入歧途。結果：全國將變成新舊、大小、南北軍閥混戰的局面。您如練有十萬精兵，加以政治訓練，而趨向正確的政治目標，必可統一中國。」

最後，鮑尚勸馮與新派革命同志，如宋慶齡、鄧演達等合作，另樹一幟。又說他今雖快快回俄，但如有需要，可隨時再請其來相助。馮均未置答。

汪精衛密電促殺鮑

鮑羅廷原想在鄭州多住幾天。但三十日黃昏，馮忽派簡又文對鮑示意，請其速去。

鮑即於當夜乘車離開鄭州，蘇俄派在馮軍中工作的總顧問烏斯滿諾夫及全體顧問人員，皆隨鮑一起回俄去了。

事後始知馮氏促鮑速行，是因鮑氏離開漢口後，汪精衛曾有密電給馮，請於鮑到達鄭州時就地殺之。（按汪精衛在漢口宣布分共後，共匪於八月一日發動「南昌暴動」。汪對此事曾有一段極為沉痛的報告，其中曾說：「為什麼容共政策

到發現了第三國際給鮑羅廷、魯依的命令，還不把他們一個個抓來槍斃？」可知汪對俄共黨徒痛恨之深。其電馮殺鮑，當出於此種痛恨的心理。）

馮玉祥認為這是中國三國時代，曹操假手劉表，劉表又轉而假手黃祖以殺禰衡的手法。他不肯上當下手，乃促鮑趕快離去，免得麻煩。馮氏殺鮑放鮑，究以何者為是，我們且不去管他。但馮氏一向予智自雄，一向自有主張，豈肯冒然聽從汪精衛的話。汪氏輕率的發出此電，適足顯示其不知機也不知趣了。

在五十年後的今天，我們讀罷馮、鮑兩人的這段談話之後，對於其有關中國革命的目標、手段，以及中國前途和馮軍命運的推斷等等，已有幾十年的歷史為之佐證。茲均存而不論。但如以研究歷史的眼光，另作分析，似可得到如下的認識：

鮑羅廷於蘇俄一九一七年革命成功，建立蘇維埃政權之後，首先被派往土耳其，幫助土耳其進行革命。他曾發揮其長才，對於土耳其的革命工作，作了相當貢獻。可是凱末爾（土耳其的革命領袖，該國尊之為國父。）革命成功，建立政權，就把他送回俄國。

跟着他又奉派來到中國，從事在土耳其同樣的任務。而在中國的國民革命，正邁向有利發展之際，他又被遣送回俄。這除了共產主義和共產制度不適用於中國的原因之外，（國父和越飛的聯合宣言，曾有明白的表示。）另一重要的因素，還是中國人的愛國情操和民族意識，不容許外國人來從中操縱，有以致之。

攻寧攻漢兩項謀略

鮑羅廷給馮玉祥所劃的兩策——攻寧（南京）、攻（武）漢，前者未曾向馮提出，縱然提出馮也不會接受。後者雖已提出而馮未予理會。我們以事後之明，就當時的主客觀環境，論理論勢，此兩策都不可行。

先說攻寧（南京）：

南京的國民黨中央和國民政府，是屬於反共救國的正統中央。馮玉祥正在戮力於國民革命，安肯自毀立場，對中央揮戈相向。他爲了完成北伐大業，不願作圍牆之爭，連武漢都不肯進取，何況南京。這是就理而言。

至於論勢，那是更不能採行。因爲當寧（南京）、漢（武漢）相持之際，南京方面的北伐大軍，一律由徐州前線撤回江南。敵方的奉軍主力及孫傳芳、張宗昌的大軍，均在豫（河南）北、魯（山東）西南、皖（安徽）西北及蘇北（江蘇北部）一帶，與革命軍對峙中。其加給馮軍的壓力，遠較南京方面爲大。

馮玉祥在強敵環伺之下，自顧不暇，豈敢捨敵而攻友，孤軍深入，自取滅亡。況且還有一個動向不明的閻錫山，窺伺在側。馮軍內部，也有反側勢力的存在，如新附的劉鎮華、靳雲鵬及老戰友岳維峻等皆屬之。稍一不慎，全盤皆輸。

馮玉祥向來持重，豈能輕舉妄動，冒此大險。所以襲取南京，是絕對不可行的。

至於攻略武漢，就馮軍當時的處境及利害看，似不失爲一可行之策。但如深加研究，問題并

不是那麼簡單。

其一，徐州會議前後，蔣總司令堅主京（南京）、豫（河南）雙方，同時進兵武漢，因馮玉祥不願內闖而未果。此時南京政局醞釀變化，蔣總司令準備下野。馮玉祥如果孤軍南進，很難得到南京方面的協力。則奉軍及直、魯軍緊蹙其後，馮軍腹背受敵，其成功失敗的公算，實以從者爲多。影響所及，國民革命軍的北伐大業，必將敗於垂成。

其二，就算馮玉祥能够擷取武漢，掩有兩湖，中央政府也不會聽其據地稱雄，養虎遺患。「討唐」（生智）、「討桂」（李宗仁）的戰爭，將會轉變爲「討馮」的。鮑羅廷所說：「得兩湖之地……：國民軍的勢力尙可保持長久些。」未免想的太天真，看的太容易了。馮玉祥不曾接納他的意見，稱得上是冷靜、明智而正確的。

也許有人會問：過此不久，孫傳芳偷渡長江，不是在龍潭之役被革命軍澈底殲滅了嗎？以後南京「西征」，不也是很快的就把唐生智打垮了嗎？我願指出：這兩者的情況完全不同。南京方面在此兩役中得以收功，實因馮玉祥的大軍，其時正在豫（河南）北、豫（河南）東、及魯（山東）西地區，與奉軍、直、魯軍，連番拼鬥，牽住了敵方大軍。南京方面無後顧之憂及兩面作戰之慮，才能順利推進，獲得勝利。馮玉祥則不然。如果他揮軍南進，則南京方面正在與孫傳芳隔江對峙。力求自保之不暇，馮玉祥就得不到一如他們那樣的幸運，必將陷於兩面作戰的境地，其結果將是很危險的。

也許還有人會說：蔣總司令下野以後，南京羣龍無首。奉軍遠在黃河以北，孫傳芳又值龍潭新敗，一時勢難復振。馮玉祥此時如果放胆南下，一定會輕易的擊下武漢，那麼，中國的情勢發展，恐怕又大大的不同了。我答：誠如所說，如果馮玉祥那時的南取武漢，掩有兩湖（湖南、湖北），財用及武器問題均獲解決，形成一股更強大的勢力，沉機觀變。恐怕北伐就要中阻，大局就要改觀，那一時期的中國歷史，確實就要重寫了。退而言之，一如民國十八、九年的中原大戰的情況發生，馮軍或不會失敗的那麼慘。蓋中原大戰時馮軍之敗，主要是吃虧在一個「窮」字。軍隊不能太富，富了就容易腐化，不能打仗。但是也不能太窮，窮了就不易維持紀律，容易受外界誘惑。馮部韓復榘首先歸順中央，以後也有好幾個將領尾隨而去，主要的原因，就是因爲太窮太苦，乏餉缺彈，實在撐持不下去，才選擇了另一條途徑。至於說什麼效忠中央，致力和平的一番大道理，那只是表面的文章罷了。

關山煙塵記

喬家才著定價50元

全書五百多頁三十五萬字定價伍拾元請寫明收書人地址姓名，附郵票伍拾元寄中外雜誌社，立即按址寄書（平郵免收寄費掛號加陸元）